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

柯木林

自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向外国派驻使臣时起，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明文规定：使臣必须写日记定期寄回。按照这规定，日记既要记交涉事件，又要记风土人情，还要使“数年以后”的中国人看了能够“洞悉各国事机”。这实际上是治个人记事和工作汇报于一炉，使这种日记得以成为后世十分珍贵的 外交史料。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既为“南洋第一埠头”，晚清名人如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在遣洋出国途中，也到过新加坡。出国期间他们都写了一些日记。1982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在郭舜平、周赞加、李少雄等人的努力下，编辑了《晚清海外笔记选》一书，选录了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末时期有关东南亚、南北美洲等地区华侨情况的记述。本文主要是介绍该书中有关新加坡记载较有参考价值的部分，俾让读者了解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社会风貌与民俗人情。

《晚清海外笔记选》中有关新加坡的最早记载见于斌椿的《乘槎笔记》。斌椿为清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同治五年（1866年）奉命率领张德彝等前往法、英、俄、德等国游历，采访风俗。他在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抵达新加坡，见到英国炮台，形势雄壮，“洋楼颇宏整”。这时华族人口约有七、八万之多，多为谋生而来，“不惮险远也”。“山多虎，每出觅人食，且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备”。可见当年的新加坡还是十分荒凉的。

斌椿的随员张德彝在是年（1866年）8月11日由欧洲返航时，经过新加坡。在他所著的《航海述奇》中，记述了新加坡海港的情景是：“海水澄清，山峰竞秀”，“岸上有土人售卖藤子、蕉子、小猴、小鱼、五色花鸟、八哥、鹦鹉等。”



这是早年新加坡的海岸线情景

十年后（即 1876 年），张德彝再度来新。这时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已有“十万众”，“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胡亚基（原文写作胡琮轩）已任“俄国领事官，英国议事官”。旅新期间，张德彝乘坐双马车，到距市区二十余里外的“胡公园，又名黄埔园”（即南生花园）游览，并在粤人所设的“新远香楼”用餐，一路上“薰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语，红绿参差”，一片热带风光气息，跃然纸上（张德彝，《随使日记》）。

《使西纪程》

相信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都读过《中华文选》中的“新加坡洪家花园记”一文。这篇有名的文章，作者就是郭嵩焘，晚清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光绪二年（1876 年），清政府为了玛嘉里案，被迫派遣郭嵩焘为正使，刘锡鸿为副使，启程前往英国“谢罪”[1]。他们在是年（1876 年）10 月 28 日下午抵达新加坡。在郭嵩焘所著的《使西纪程》及刘锡鸿著的《英轺日记》中，都记述了他们在新加坡的活动。他们游览了“胡氏园”（南生花园），“憩于其圃”，对园内“奇花异草，珍禽怪禽及所陈设”，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新加坡总督雷哲(William Drummond Jervois) 亦派其翻译必麒麟 (W. A. Pickering) 遣马车陪同游历。参观当年巡洋至新的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会见兵船提督蔡国祥、国喜两兄弟及侨领胡亚基。“船兵皆升桅声炮”。然后在必麒麟陪同下，至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致。...”，可惜洪家花园的确实遗址，如今已不可考了！

光绪四年（1878 年），清廷派遣曾纪泽为驻英、法大臣。曾纪泽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曾国藩的儿子，清朝驻新加坡第一任领事官左秉隆的顶头上司。1878 年 11 月 12 日抵达新加坡，接见了新设的新加坡领事胡亚基 (原文写作胡璇泽)。曾纪泽抵新时，可能已过晌午，“英人休息较早，已闭店门，华人贸易正喧闹也”。新加坡“庙宇、会馆、酒楼、戏台无不具备。...土产胡椒、蔗糖、槟榔、椰、瓜及诸果实，天气极热如盛夏，以树林茂密故无瘴气”(曾纪泽，《使西日记》)。

曾纪泽与胡亚基（原文为胡琮轩）久谈，谈话内容是有关中国领事官在新筹募经费之事。胡亚基讲的是广东话，曾纪泽是湖南湘乡人，不谙粤语，“因以英语相问答焉”。曾纪泽记述他在津沪时，遇闽广人谈及胡亚基，“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这段文字记载，栩栩如生，笔者认为十分精彩，颇可一读。

《出洋琐记》

《出洋琐记》的作者蔡钧，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初二日在遣洋回国途中抵达新加坡。当时胡亚基已在四年前辞世了，继任的左秉隆领事是从北京直接派来的官员。左秉隆自1881年9月25日领凭上任迄今，已有三载。蔡钧抵步时，便乘车至“大清国领事府”，访左子兴（秉隆）司马。从另一项记载看，当年的中国领事署是“租于民间”的（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约距市区四、五里。蔡钧与左秉隆“清谈既久”，左氏仍邀请他去看广东大戏（“司马邀往观剧，优人皆粤产”），或许由于左秉隆是广东番禺人的缘故吧！

蔡钧观察到新加坡的“风俗习尚，仿佛粤东。天气四时皆热，早晚如中土夏初，正午直若中土三伏。佣工者得单衣一袭，可供一年之用，故喜于此处旅居也”。至于市场贸易，道路负贩（街边小贩），“皆中土人”（华人），“街衢整洁，房屋华盛，远逊香港，惟多平壤，一望延袤...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

19世纪80年代，贸易有着长足的进步。商业的发展，资本的累积，出现了殷商。配合了清廷“鬻官制度”的实行，一时炎徼殊域，翎顶满街走，“大夫第”和“朝议第”炫耀门楣。这正是蔡钧所记载的“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阀之荣，皇灵之震叠，不既远免哉！”

此时华族人口，“约计有十余万，闽居其七，广居其三。”殷商的住宅，除广夏闰闼外，“更有极富者，皆置花园”，“车马精良，陈设珍异”，而“开筵宴宾，亦极丰腆，中西之俗参半”，正是当年上流社会生活的写照。（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袁祖志是清代著名文人袁枚之孙。）

商业社会的副产品是“鸦片烟廊暨酒店甚多，两种生理，日纳税银二千元。妓寮极夥，税亦甚巨。置屋产者利十税一，其他称是，一年所入，不知凡几”，可见经营声色娱乐及屋业的，在百年前已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晚清访新官员中，有一位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堪称教育学者（他亦精通地理学），此人就是邹代钧，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廿四日抵新加坡。在他所著《西征纪程》中，对当年新加坡文教情况的记载是这样的：“新加坡旧本柔佛国，南海中小岛...其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圣经贤传竟不与目。”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薛福成是由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改良主义政治家，他与郭嵩焘可说是晚清外交官中之佼佼者。光绪十五年（1889年）奉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著名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就是从次年出国之日起写的。中学时代读过“巴黎观油画记”和“游蜡人馆记”两篇文章，就是从这部日记中节录出来的。薛福成比郭嵩焘小整整二十岁，出使四国时，已年过半百，文章早已海内闻名，政治上也已经形成系统的观点。这部日记，可视为他研究国际问题，讨论中外关系的最后作品。其中的思想，概括一句话，就是：“中国必须开放”。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二十二日薛福成到新加坡。其时左秉隆领事仍在任上，“左秉隆子兴率其侄随员即选知县左棠树南来谒”。薛福成对左氏评价甚高，谓：“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浹洽，办事颇称稳愜，盖领事中之出色者。”

据薛福成记载，英国当年在新加坡有“水陆兵房二所，约有兵丁三千。有机器厂大小五所，书院三所，而中国亦有一所，曰‘萃英书院’者，商人陈金钟所创也。”

薛福成也接见了“英巡抚施密司”（即坡督 [2] Cecil Clementi Smith）及“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官陈金钟”。此时陈金钟年事已高了，“金钟字吟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金钟颇疏财好义...年六十余，有十子，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

新加坡的海港，“商舶云集”，这是英政府采取自由港口贸易的结果。“英人不税进出口货物以示招徕”，“今只抽洋药税、酒税，每月可得八十五万元。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元”。新加坡“不生五谷、棉花，俱由他埠运来”（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1890年正是新加坡开埠后的七十年，当时华族人口已增至“十五、六万矣”。“此间人民最杂，约有十数种，如闽、奥、琼州、嘉应州，印度暨噶罗巴（雅加达）所辖诸岛如西里百（西里伯斯），爪哇（今亦称爪华），吉宁言语格不相入。除华民外，巫来由族及印度人约有十万，英人三千。”

世事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从访新的晚清官员笔记中，可以略窥新加坡社会与人事的变化。光绪二十年（1894年）晚清官僚王之春访问新加坡时，左秉隆领事经已调职，继任的是“总领事候选知府张振勋（弼士）”。当年著名的南生花园，在胡亚基逝世后家道中落，也已变故了。“复询陈金钟，云已前年歿，其家今亦中衰”。人事沧桑如斯，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薛福成出使时，新加坡有闽、广人约十四、五万，如今已增至廿一万余人了，“此外英人二千余，土著阿刺伯、印度、巫来由各种亦止共数万人。然英税华货独苛，洋货每百不过抽五，华货则每值百抽至十余元不等，此殊未足以持平也”。（王之春，《使俄草》）。

晚清海外笔记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尚见于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力钧的《槟榔屿志略》及阙名的《游历笔记》等，由于资料与其他笔记中所载略同，故不复赘。

摘自 柯木林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页12-21。

【注释】

[1] 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副将柏郎(Browne)奉命自缅甸取道入云南,北京英使馆翻译员玛嘉里(Nargary)从云南入缅迎接。1875年玛嘉里回云南,途中为土人所杀。英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指此事件为滇抚岑毓英所主使,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下旗归国,谓以兵戎相见,以相恐吓。清廷卒表示让步,于1876年派李鸿章与英使签订〈烟台条约〉。

[2] 坡督,指海峡殖民地总督,“坡督”为其俗称。

附：清季来往新加坡人物表

姓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斌 椿	同治五年 丙寅 (1866)	过境。	《乘槎笔记》
志 刚	同治六年 丁卯 (1867)	赴西洋办理中外交涉，途经星洲。	《初使泰西记》
王 韬	全上		《弢园文录外篇》、 《漫游随录》
宜 厘	同治七年 戊辰 (1868)	过境赴泰西。	《初使泰西记》
王 芝	全上		《海客日谭》
严宗光	同治十年 辛未 (1871)	时为船政学生，被遣派巡历至星洲。	《海军大事记》
王承荣	光绪元年 乙亥 (1875)	赴英、法、德考察炮厂，途经星加坡。	《游历记》(钞本)
萨镇冰	全上	登船见习，游历至星洲。	《海军大事记》
郭嵩焘	光绪二年 丙子 (1876)	任驻英大使，十月廿八日经星加坡。	《随使日记》、《使西纪程》
刘锡鸿	全上	随郭氏赴英。	《英轺日记》
张德彝	全上	经星洲赴英上任。	《航海述奇》
李 圭	全上	赴美参加美国立国百年大会，行经星洲。	《东行日记》，《环游地球新录》
钱德培	光绪三年 丁丑 (1877)	十一月初一抵星，日记中载该地风物。	《欧游随笔》
黄楫材	光绪四年 戊寅 (1878)	游三藏五印度后，十月间抵星。	《西轺日记》
曾纪泽	全上	曾氏出使英、法大臣，十一月十三日过新加坡。	《使西日记》
徐建寅	光绪五年 己卯	九月间抵星，领事胡璣泽派员上船谒见。	《欧游杂录》
马建忠	光绪七年 辛巳 (1881)	七月至星洲。	《南行记》
吴广霭	全上	与马建忠同抵星加坡。	《南行日记》
蔡 钧	光绪十年 甲申 (1884)	三月抵叻，杂记该地华人生活情况。	《出洋琐记》

姓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邹代钧	光绪十二年 丙戌 (1886)		《西征纪程》
王荣和	全上	访查南洋华民商务。	《李文忠公全集》 (电稿七)
余 璩			
邓世昌	光绪十三年 丁亥 (1887)	抵星洲购买粮煤。	《叻报》
洪 钧	丁亥九月廿一日	洪钧 (齐乡) 使欧经叻。	《叻报》
许景澄 (竹笈)	光绪十四年 戊子 (1888)	出使俄、德及义荷奥各国大臣自欧返国，途经星加坡。	《叻报》
洪 勳	全上	目睹泰西水师会操于星。	《游历闻见总略》
张荫桓	光绪十五年 己丑 (1889)	出使美国兼苏秘大臣自欧洲返国，经星洲时，左秉隆尝作东道，因撰诗奉寄。	《三洲日记》
卫铸生	全上	九月卫氏抵星，与左秉隆领事唱和。	《叻报》
潘飞声	光绪十六年 庚寅 (1890)	游荳蔻园赋诗。	《天外归槎录》
梁逢云	全上	过境。	《叻报》
薛福成	全上	偕夫人及随员二十余人乘法国邮船抵叻。	《出使四国日记》
丁汝昌	全上	率领北洋舰队于四月抵星，宣扬清廷德化。	《叻报》
刘芝田	全上	卸公使职，自欧返国经星。	《叻报》
陶渠林 王芷帆	光绪十七年 辛卯 (1891)	过境返国。	《叻报》
丁汝昌	光绪二十年 甲午 (1894)	率舰队抵星，顺道抚慰侨民。	《叻报》
王之春	全上		《使俄草》
李鸿章	光绪廿二年 丙申 (1896)	赴俄参加庆典，路过星洲，稍作逗留。	《叻报》
吕海寰 (镜宇)	光绪廿三年 丁酉 (1897)	使德大臣经星洲登程赴德就。	《叻报》
康有为	光绪廿六年	应邱菽园之邀，避地星洲。(其中	

姓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庚子 (1900)	庸注即撰于檳榔嶼之明夷閣)。	
載 澧	光緒廿七年 辛丑 (1901)	八國聯軍之翌年，奉命赴德請罪， 途經叻埠。	《叻報》
張德彝	光緒廿八年 壬寅 (1902)	出任為駐英公使，過境赴歐履新。	《叻報》
載 振	全上	過境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大典。	《英轺日記》、《清史稿》
羅豐祿 (樞臣)	全上	出使英義比；自歐經星返國述 職。	《叻報》
楊誠之 (兆鑒)	全上	出任為比國公使，路經星洲，再赴 歐履新。	《叻報》
載 倫	光緒三十年 甲辰 (1904)	出洋考察後，自歐抵星，再返回中 國。	《叻報》
張振勳	光緒卅一年 乙巳 (1905)	往南洋查察商務，兼宣慰僑民。	《叻報》、《檳城散 記》
載 澤 尚其亨	光緒卅二年 丙午 (1906)	經星洲返國。	《叻報》、《清史稿》
戴鴻慈	全上	差往俄國，事畢經叻返國。	《出使九國日記》
端 方			
陳寶琛	全上	專程赴星推銷漳廈鐵路股票。	《叻報》
錢 恂	全上	稽查華僑工商業務實況。	《叻報》
董鴻祜			
何品璋	光緒卅三年 丁未 (1907)	奉北洋大臣命赴星巡視。	《海軍大事記》
楊士琦	全上	侍郎乘坐海圻軍艦巡視南洋各島， 旅次星洲。	《叻報》、《清季外 交史料》、楊圻《新 嘉坡詩序》
王大貞	宣統元年 己酉 (1909)	以郎中赴星宣慰僑民。	《叻報》。楊圻《詩 序》稱庚戌。
趙從蕃	宣統三年 辛亥 (1911)	以郎中在星洲考察僑民商務。	(星洲)《中華總商會 會議記錄》
劉玉麟	是年八月	出使英國大臣赴英途經新嘉坡	《宣統實錄》

资料来源：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 325-327。